

〔法〕亚历山大·阿德勒等著 王林尽 李宝源 陈 沂译

苏联和我们

SULIAN
HE
WOMEN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32.527
282

苏联和我们

〔法〕亚历山大·阿德勒等著

王林尽 李宝源 陈沂译

zk602/15



L'URSS ET NOUS

Editions Sociales

苏联和我们

〔法〕亚历山大·阿德勒等著

王林尽 李宝源 陈沂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1,000 印张：7.5 印数：1—10,400

统一书号：3109·489 定价：0.72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系由弗朗西斯·科恩等五名熟悉苏联情况的法共党员集体撰写的。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苏联社会的现状及其矛盾,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对研究苏联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在对外政策方面认为苏联实行“和平外交”,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履行国际主义声援义务”。与此同时,却诬蔑我国的对外政策,攻击我国“进行霸权主义活动”等。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作者说明	(1)
引 言	(3)
第一章 历史背景	(23)
第二章 斯大林时期的现实	(36)
一、初步总结	(36)
二、一些看法	(61)
第三章 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	(74)
第四章 经济中的动力和障碍	(100)
第五章 政治生活面面观	(131)
第六章 文化与思想意识	(178)
一、文化历险	(178)
二、意识形态的变化	(188)
结 论	(207)

作者说明

这本书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由《新评论》以《苏联和我们》为标题发表的文献的编撰工作的继续。

它是在法共二十二大开辟的走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景下，一些共产党人集体思考的结晶。

现在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这里将批判性地，也就是说，尽可能客观地来考虑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矛盾以及它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运动中的意义。

本书提出一些分析、假设、疑问和研究方向。我们将不下断语，只是想归纳一下现阶段的形势。

作者都了解苏联；他们经常在苏联停留，对它进行观察；他们在苏联都有朋友。他们毫不隐瞒他们热爱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们认为尤其必须明确说清楚，发展法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苏联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性。

本书各章节都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但多数章节中体现了执笔者个人看法的色彩。

引言和第一章“历史背景”是由弗朗西斯·科恩^①执笔的。

第二章“斯大林时期的现实”第一部分由亚历山大·阿德

① 弗朗西斯·科恩，法共原理论刊物《新评论》杂志社社长、《国际研究》杂志主编，法共中央国际部干部和法共党报《人道报》前驻莫斯科记者。一九八〇年春，《新评论》停刊，与法国另一党刊《新法兰西》合并创办新刊物《革命》。

勒^①执笔，第二部分由弗朗西斯·科恩执笔。

第三章“社会结构的几个特点”由弗朗西斯·科恩、莫里斯·德卡约^②和列昂·罗贝尔^③集体撰写。

第四章“经济中的动力和障碍”是由莫里斯·德卡约执笔的。

第五章“政治生活面面观”，是由亚历山大·阿德勒、弗朗西斯·科恩、莫里斯·德卡约、克劳德·弗里乌^④和列昂·罗贝尔进行座谈的一份记录。

第六章“文化与思想意识”第一部分由克劳德·弗里乌执笔，第二部分由列昂·罗贝尔执笔。

结论部分是由弗朗西斯·科恩撰写的。

本书这种结构说明了在文风上存在的一些不一致，从而会有某些评价上的差异，对此我们并不自我宽恕。这些都表明我们正处在探讨过程之中，而这一探讨还远远没有结束。

① 亚历山大·阿德勒，法共党员、历史学硕士。

② 莫里斯·德卡约，法共党员、经济学家。

③ 列昂·罗贝尔，法共党员、俄罗斯诗词专家、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院教授。

④ 克劳德·弗里乌，法共党员、俄罗斯文学专家、巴黎万塞纳大学教授。

引 言

法国共产党人对苏联需要有一个现实的看法。这出自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下述原因：

由于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这个国家所具有的份量以及它在当代世界中占有的地位，法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状况和法国的形势、尤其是对它们的前途的任何考虑，都不能撇开苏联不谈。

近几十年来，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使人们越来越强调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目前，在这个星球上仍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个制度——人们称其为“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制度——终究摆脱不了破坏着它的四伏的危机。危机来自两方面：世界的一部分已摆脱了这个制度，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世界的另一部分，被称为第三地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摆脱这个制度，并且日益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这是危机的根源之一。第二个根源在于这个制度的矛盾本身，除非进行变革，而且这种变革亦能展示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否则这些矛盾将越来越无法解决。

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法国共产党，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召开的二十二大，制定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这条道路的制定主要是依据对我国形势的分析，并通过政治实践，同时也需要了解和研究现有社会主义的经验，或者从中得到启示，或者吸取其教训。社会主义世界是多样化的，它的任何组

成部分都不应被忽视。但显然，苏联在其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它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国际运动中曾发挥过领导作用，因此，苏联的经验和对苏联的态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再者，必须清楚地看到，苏联对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对法共的影响比其他某些党更为巨大。法共的诞生、其生存及活动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苏联，然而法共的许多缺点也应归咎于它。我们可以想到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学会不断地纠正这种状况。

苏联本身也在变化，必须对此作出估价。确实，法国人民群众越来越认识到，苏联的现实不是一个应遵循的样板。当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和特点在法国日益明确显示出来时，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它所采取的方法是怎样出现新的失调的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除此之外，还要补充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法国共产党人这些年来更关心确定自己的道路，更关心对苏联生活中发生的某件好事或坏事就事论事地表态，而没有对苏联提出一套完整的看法。可是，现在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工具的看法。他们把苏联说成从骨子里都是坏的；另一种是一些党员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看法。他们把苏联看成绝对的好。对于往往被革命理想吸引的青年一代来说，以及对于党内占多数的新党员来说，现在是做出努力来确定一个现实的看法的时候了。

为了使观点具有一致性，就不能满足于把一些不同的情况或者互相对立的情况罗列出来，简单地认为某部分情况比另一部分情况重要，而应考虑到这些情况是并存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的，要设法洞察苏联社会的总的运动及其带有全球性影响

的变化。

法国共产党人今后拒绝把自己看成或被人看成是围绕下述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整体部分，更不是这个中心的附属品；即，这个中心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进程，社会主义将从这个中心产生出来。法国政策的任何细小部分都不可能在莫斯科制定。但同时，法国的工人阶级和法国的革命运动又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进程中，苏联依靠其它力量，但更依靠它自身的力量，在物质和思想方面占有非常现实中的地位。这首先是為了扼制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是个“非同一般”的国家，对待苏联经验，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态度：把我们需要的经验挑出来，把我们不需要的经验剔出去。如果我们只限于对阴暗面和光明面进行对比式的描述，人们就可能反过来质问我们：难道阴暗面不是光明面不可避免的代价吗？今后我们所倡导的那美好的社会主义难道就没有令人无法接受的坏的一面吗？

因此，我们的态度是全面地观察苏联的现实。为此，我们打算往后看几步，从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及其方向上去识别运动。我们试图集中思考六十年来，在接连不断的动乱中，在这个国家身上打上了深刻烙印的那些事态。六十年来这个国家处于全球斗争的中心。

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现实是如何构成一个历史规模的现象的。我们不打算用先验论的标准，不打算根据普遍认为“应该”是如何的假设去判断该现象，也不打算把该现象当做一个简单的历史产物来研究：先是历史的前期，这段时期为这个简单的产物提供了以必不可免的预定的方式发展的场地；然后是历史这个受到一些同样不可避免的因素决定的创造者本身。

我们认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应该从它自身的目的、它的诞生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以及它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把一个普遍适用的蓝图用于某一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当然，苏联的革命和生活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文化和地理条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用很大篇幅来谈这些情况。但是苏联的历史不能仅仅用它受制约的条件来解释。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在个人或集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唯意志论所造成的一系列主观选择来解释。创造这部历史的男女不是独断专行的决策者所操纵的工具，更不是无条件地受人愚弄的对象。

这就告诉我们，不存在现成的、可以拿过来使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存在将来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时间，把这一蓝图用于法国就可以产生与过去在苏联时不同的（即更好的）结果的问题。既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就必然有千差万异的表现，而该运动的理想的模式只有在运动不断取得成果之后才可能存在，而成果有待于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满足于用引证一些已出现的错误、偏差、失策来作些解释。

错误已经出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当错误产生时，就要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在革命运动中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人们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比从成绩中学到的更多。

但是难道因为我们一旦列出错误的清单，就算完事了吗？“唉！我们错了，他们也错了，再干吧！”但这些错误、这些偏差是同什么对比而言呢？错误又是同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对比而

产生的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这不是在拒绝进行解释吗？

苏联的历史并不是由一连串的错误写成的，也不能说充其量是错误和正确的路线相交替，也不能说是两者兼有的一个混合体，因为社会主义会带来胜利，主观错误（正如刚才谈到的时空条件那样）会导致失败。事实是，社会主义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而造成一些幻想，一种特有的混乱，简单地说，就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人们不能把造成这些情况的第一位原因轻易说成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的错误只要纠正过来，就能指导现已正确的革命进程了。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事，千头万绪，怎能仅仅指望靠一个概念性计划来保证，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呢？

如果我们想通过了解苏联的经验来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苏联，研究它的实际矛盾。正是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将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我们掌握的材料无疑是不完整的，但这些材料也决不可忽视。苏联掌握和介绍自己的材料也不少（但它常常被人们忽视），对于愿意阅读这些材料的人来说，是可以获得一些真实情况的。除那些纯系庸俗的宣传材料外，西方的苏联学研究在不同的专题方面都提供了越来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克里姆林宫学”也有它的贡献，如果人们不再把人员的等级看成政治变化的原因，那么，领导岗位的人事变动便是政治意图和决策的有价值的寒暑表。

我们将以对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来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来源。我们将从中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事实和问题，并把它们同我们个人的认识进行对照。这将有助于我们的设想的形成，也有助于启发我们做出解释。

我们以前对苏联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法国共产党人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是随着法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只能说明它本身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法国社会党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在都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多数通过决议决定转为共产党并参加第三国际的时候起，十月革命所显示的历史转折就已在工人运动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十月革命初期起，法国黑海舰队的水兵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干涉部队就毅然拒绝继续打仗，拒绝向人民的革命开火。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激烈的思想和政治辩论，这场辩论既涉及这一运动本身的前途，也涉及对俄国革命的意义的评价。

一部分人希望在俄国发生的是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协调一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十月革命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些人不相信也不希望发生了这场革命，另一些人不但相信这场革命而且坚决地走上了这条新的道路。都尔代表大会选择的的就是后者。

从那时以来，事物也同各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一样，显示了它全部的复杂性。本书不准备——阐述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这一问题的历史事实，再说它已同法国共产党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了，而法共历史的许多方面尚有待于探讨。我们只能为开辟这一研究道路奠定一些基础。

正如社会党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样，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而且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这是符合当时那种认为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国

际组织这一强烈主张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就是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首次体现。这是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掌握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在实践中,它又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即某一时刻,在各国党里出现的不同形势、不同战术观点、不同的战略设想常常或多或少地为集中做出的决定所窒息。这就使得,当时仅仅只领导一个国家并还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党的影响在各国党的中央机构中起着压倒优势的作用。因此,在最初的年代里,当法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遭到挫折,四面受敌,需要实际锻炼和巩固的时候,那种是本国先锋队和國際先锋队的思想,可能在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起到了松散党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作用。一个国际党通过组织机构把它的纪律强加于人并使人被迫接受的想法,可能与工人阶级要在国内扎根和发挥其在本国的作用的观点,即在法共处于斗争的伟大时期曾出现过的观点相冲突。

但是,曾占支配地位,后来一直发挥支配作用的是苏联随着它本身的日益发展,以及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所发挥的越来越实际的作用。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在当时就是保卫社会进步的新体制,保卫受到四面八方进攻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堡垒。苏联的失败会延长剥削制度在全世界的寿命。当时人们保卫的是一个支持和平的力量,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支持反抗民族压迫的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后来的热战中,反苏主义成了帝国主义有力的思想武器。冷战时期,这种反苏主义尤为猖狂。反苏有双重目的,破坏社会主义的信誉和破坏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为直接入侵苏联创造条件。我们那时候的反映十分

强烈。象皮埃尔·古达特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九四六年在他他的《评反苏主义》一文中竟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每打击一次苏联，国际法西斯就赢得一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始终是正确的。”一九四八年十月，莫里斯·多列士提出如下口号：“法国人民将来不会、永远不会同苏联打仗。”

这些言论并不是象某些人所企图歪曲的那样是什么效忠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在团结各种反对战争和反对社会倒退的力量中发挥了作用的政治行动。

今天，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使用反苏主义这一武器。只不过由于帝国主义本身的地位因受到各种危机的侵蚀而已大为削弱。我们的反击也不再是背城借一之斗了。我们在反击中采取的是更有论据的、更合适的形式：我们已学会从无条件的保卫过渡到象本书所尝试采取的这种解释性方式。

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把第一次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模式的倾向。

这里带有一点幻想的成分，即认为钥匙找到了，门已打开，人们便可进入天堂了。显著的成绩导致了某种理想化的看法。在这理想化中产生了观念的斗争：在实际存在的或设想的错误面前，我们仅仅看到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经济的飞跃。“新人”超众的典范，却有点忘记了历史本身自始至终贯穿着矛盾，不能因为别人决定那样做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地点和时间都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这本来是不应该忘记的事情。

就因为苏联当时在向前发展，所以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样想，这样说，难道不是有点公式主义了吗？过去认为凡是来自苏联的东西都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我们永远信任这个

历史的开拓者，它开辟了所有的道路，我们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我们曾宣布自己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由于苏联本身，也由于它在世界上的敌人，我们曾把苏联党的总书记个人看成是整个新制度的化身。这种个人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是庸俗的。苏联实行的极端集中制使斯大林得以干预苏联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当时对待斯大林的感情，并不是出于效忠，而是把它当做激励人们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思想和政治方法。

一方面在三十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苏联的影响下获得新生的。苏联在出版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威望引起了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注意，这时正好遇上了由于法国工人运动本身的需要而引起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热潮。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后来又在战后，一种把科学精神缩小为某种逻辑规划的倾向在我国盛行起来了，这给人们接受斯大林时期的那种相当荒唐地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做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切不可忽视理论上的思考和日常政策之间常常存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接受的在那个时期最典型的一种教条主义的歪曲——李森科^①的生物学理论，就足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在哲学和科学实践的关系上我们有机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对来自苏联的一切采取了完全信任的态度并把那场辩论拉入冷战之中，使辩论立刻带上了政治含义。这仅仅只是一个例子。

① 特·杰·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曾任全苏农业科学学院院长，提出植物分阶段发育理论和春化法等。他把自己的论点和看法称为“米丘林遗传学”，反对摩尔根学派的基因理论。一九五六年后受到批判。